

该不该鼓励孩子当班干部

热点关注



滕朝阳 著
新华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家庭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础。然而，太多的自以为是，太多的似是而非，太多的跟风盲从，使很多为人父母者至今未能成为这一理念的自觉践行者。著名教育专栏作家滕朝阳用实际的育儿经验告诉年轻的家长们，家庭教育是成长无可替代的奠基，而父亲的言传身教之于子女成长具有母亲不可替代的作用。他反思管理孩子的经验以及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故事，并上升到教育理论，从中发现很多有益的经验，对家庭教育很有帮助。

[上期回顾]

帮助孩子养成好习惯或去掉坏习惯，都是渐进的过程，都免不了要与人性的弱点作斗争，都需要足够耐心。

在儿子未上小学之前，我对班干部的认识很不全面，甚至还有点偏激。这当然也是事出有因。大约五六年前，听说福建一些地方，中小学班主任迫于关系压力，给有背景的学生安插各种班干部头衔，导致班干部严重“超编”。比如一个中学的初一某班，共有52名学生，班干部竟然多达22名。这种被严重扭曲的现象，很难不使人心生愤怒，进而对社会不正之风侵染校园的恶劣行径加以猛烈抨击，呼吁素质教育应从娃娃抓起，当官不要从娃娃抓起。对班干部的存在及其价值，不做具体分析和全面了解就断然下结论，有简单武断之嫌。

儿子上学后，我逐渐认识到，孩子担任班干部的确是一种历练。当然，使这一结论成立，也有不可或缺的前提。

据我所知，现在班干部的产生方式，主要有三种：一种是任命制，一种是轮换制，一种是选举制。我认为最后一种方式更优。

任命制的传统似乎很悠久。轮换制虽号称新模式，但实际上不过是轮流坐庄的翻版。有人说这可以培养学生的主人翁意识，体现了一定的公平性，我却看不出有这诸般好处。反正，愿干的不愿干的、适合干的不适合干的、干得好的干得不那么好的，都有干的机会，而且必须得干(要不就没有主人翁意识)。这似乎不是什么公平，倒与我们熟悉的“大锅饭”很神似。

从成人社会导入的选举制，才真正称得上是新方式。班委、小组长以及其他“职位”，先公布出来，学生根据自己的情况报名参选。竞选前，学生要准备演讲材料，无非是为什么要当这个班干部，当了之后又将打算怎样做。演讲一结束，同学们当场投票，班主任根据得票多少，决定

班干部人选。由于是一种新事物，班干部“任期”没有统一标准，事实上也没有必要标准统一，大抵以一学期两次为宜，开学时一次，学期中间一次。

班干部竞选的整个过程，若无外因干扰，可说基本能做到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。在此过程中，班主任并不也不应置身事外、袖手旁观，而要制定游戏规则、组织竞选工作，特别是要帮助学生树立与班干部相关的正确理念。有的孩子觉得当班干部“很威风”，有的孩子认为当班干部“有好处”，这些不当观念都需要班主任加以教育纠正。

不难看出，竞选方式有前两种的好处，却没有它们的明显缺陷，对孩子从小培养民主精神、责任意识、规则秩序自觉大有好处。有时，由于报某个“职位”的学生有好几人，角逐比较激烈，落选就在所难免。据老师说，有的孩子没有选上，家长便和孩子抱头痛哭。这样看来，参与民主选举班干部实践，于孩子也未尝不是一种挫折教育。不至于长大成人之后，没有竞选上某个职位就跳楼自杀，或是没有当上一个什么官就抑郁而死。

我儿子所在的小学，能不能当班干部、当什么班干部，不是老师任命或轮流坐庄，而是必须通过竞选。对这件事，儿子有一定兴趣。我想，可能主要是一种基于自爱的荣誉感在推动，而这种可贵的荣誉感在成人社会早已呈现异化和衰退的迹象。竞选前，儿子会精心准备好演讲稿，若给我们看，就给他指导一下。参与竞选多了，他就只打腹稿，也不大向我们请教，或许是自以为已取得一定经验。其实，在这件事上，父母未必能比孩子做得更好(我们当班干部，有几个不是老师指定的呢？)，不出馊主意就是万幸。

最初，儿子竞选当上了班里的学习委员。“换届”时，再竞选学习委员，落选；又“降格”报小组长“职位”，本以为很有把握，结果还是落选了。这对他是个不小的打击。我清楚地记得，那学期期末考试，他有一科差点就滑到了优秀线之下。那段时间，他的课堂纪律问题颇让我头疼，老师只要有机会就说，而且经常给他单独坐在教室最后的特殊待遇。我想，总是由于他表现欠佳，同学不投他的票。有没有老师的影响呢？这我可说不清楚，但一个学生经常受到老师的批评，又被安置在最后一排单坐，在客观上应该也是一种导向。那时，我似乎也没有刻意和他讨论怎样当好一个班干部。

上了三年级，儿子的情绪开始从低谷中爬升。儿子碰到一个好班主任，所谓“经师易得，人师难求”。第一次竞选学习委员，他获得了成功；“换届”又竞选学习委员，也成功了。不过，后来有一次，他没当成学习委员，而是被班主任“调剂”当了纪律委员。我当时和儿子一样，只感到纳闷，没有体会到老师的良苦用心。就在担任纪律委员期间，他上美术课时给同学写小纸条，被同学检举，称身为纪律委员却带头违反纪律，不称职。班主任在暂停儿子的“职务”前，和他做了沟通，也和我打了招呼，我表示赞成。老师虽没有明说，我却恍然悟到老师的用意：让他由学习委员改任纪律委员，隐藏着要他加强自我管理、严于律己的价值取向。真是个有心的好老师！

老师接受了儿子的要求，给了他一个含蓄而体面的“停职反省”方式。老师告诉我，儿子生怕在班上郑重其事地宣布自己“停职”，有损自己的“威信”。这次教训比较深刻，过了大约两周，儿子因进步表现明显合于要求而“官复原职”。在此期间，

儿子心里不好受，我就主动和他谈心，既有宽慰，也有教育。我说，当好一个班干部，一是要有服务精神，二是自身要过得硬。比如当学习委员，如果学习不好，就没有说服力，你去竞选，别人也不会选你。但光学习好，不愿意帮助同学，也不能得到别人的拥护。如果你想当纪律委员，那么自己首先要纪律好，所谓“打铁先得自身硬”，否则怎么去纠正同学违反纪律的行为呢？到了学期末，同学们评议班干部的“德能勤绩”，儿子回家骄傲地告诉我，他排在第四名。

儿子上课给同学递小纸条被同学揭发，这事也引起了我的思考，因为他之前同样向老师报告过别的同学的此类行为。不是说向老师报告有什么不对，而是担心养成一种打小报告的风气。我对儿子说，不一定什么事情都要报告，当班干部首先要提醒帮助同学，如果他不改，或者他的问题确实比较严重，再报告也不迟。班干部要学会处理同学之间的问题，如果什么事情都要老师来解决，还要班干部干什么呢？再者，担任纪律委员，是“抓风纪”的，似乎也容易形成只看同学缺点的毛病。我把自己的思考和班主任做了交流，老师认为有道理。

有人认为在小学中低年级不适合以竞选的方式产生班干部，我却不这样看。只要对陶行知的试验有所了解，你就会立即改变自己的看法。但我认为，目前班干部一般被定位为老师的助手，这就可能限制班干部的功能发挥，他们应该也能够为学生自治创造新鲜经验。据说，美国的中小学没有固定班级，也就无所谓班干部。国情不同，难以比较优劣长短。只要老师善于引导，家长少插手，政府部门取消班干部升学加分等政策，当班干部对孩子的成长，一定是一种难得而有益的锻炼。

去年春晚的新春致辞我说得有些空洞

名人传记



朱军 著
江苏人民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朱军首次披露自己数年来主持春节联欢晚会的台前幕后，讲述自己的人生感悟。朱军在书中回忆了那些属于他自己的“零点时刻”：荣光时、黯然时、欢歌时、悲泣时……每一时刻的感悟，都使他的生命愈加厚重。

在书里，朱军将告诉我们，他是怎样突出重围，战胜对手，成为央视晚会的当家主持？他和范曾、赵本山、周涛、董卿、冯巩等人的情谊，以及春晚舞台上发生的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……

[上期回顾]

2007年春晚，我们六个主持人发生了所谓“黑色三分钟”的乌龙事故，原因是前面节目的时长发生变化，要主持人补时。而到了2011年春晚，类似的事情又发生了。

我有些自责，为什么不按照自己的第一直觉发言？当时上场以后，我第一反应就是想告诉大家真相：此时此刻距离一个新的春天还有一分多钟，我们几个人把所有准备好的词都已经告诉您了，现在站在了时间的门槛上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要不咱们拉拉家常，您回家了吗？您的鞭炮准备好了吗？或者让我们一起静静等待零点钟声的敲响，现在还有多少秒……

但我的职业习惯条件反射似的压倒了我的直觉判断。自己直觉所要表达的意思和之前预设的台词风格相差太远了，一堆宏大的东西，突然续了一些鸡毛蒜皮的东西，一下子把情绪降下来了，我犹豫着要不要冒险随了自己的性子。最后一个女主持人已经开口说话了，导演的指令非常明确：“朱军，你来负责零点报时，剩下的人说完自己的词都不要吭声了。”

在那一瞬间，我的个人意志终究还是服从了全局，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：“亲爱的朋友们，金鼓齐鸣，壮志飞扬……”调子渐渐拔高，把所有美好的词汇统统往里堆砌，“我想此时此刻我们都满怀着激动的心情在迎接一个崭新春天的到来。此时此刻，我们都站在了时间的门槛上，凝望着母亲的白发，抚摸着孩子的笑脸……”那一刻很紧张，也有些沮丧，为了撑时间，我的语速更缓慢了，看重播的时候都能感觉到，“亲爱的朋友们，您准备好了吗？让我们一起和着这迎春的鼓声，迎接辛卯兔年崭新春天的到来！”

这次补台干脆利落，甚至做得不着痕迹，从某种程度而言它是成功的，但它不是我心里最想说的。也许按照自己的直觉发挥，可能就会是另外一番滋味了，或者预案再充

实一些，在这之前做好一分钟、两分钟、三分钟、四分钟乃至五分钟的准备，我会说些更加实在而真诚的话，用身边的大事小情来给这个年画一个句号，也许就不会显得那么空洞了。但所有的一切已经过去了，这就是春晚，这就是直播，当过去的时候，所有的遗憾就只能是永远的遗憾了，没有机会再去弥补。

春晚零点的那段倒计时被称为“事故多发时段”，在那个特殊时刻，主持人总会格外紧张，说错话的几率也比平时高。事实上，几乎每年春晚的零点仪式都无法掐准钟点，而且随时会有突发事件，需要主持人视具体情况临场调整，因此春晚主持人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负责“救场”。救场有两大法宝，一是要具备过硬的业务能力和良好的心理素质，二是要准备应急补救预案。

直播开始，所有的灯光瞬间打开，摄像机全部投入使用，开场音乐奏响的那一刹那，好像有一针强心剂扎进我的脉管，我立即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地进入工作状态。假如把电视直播比做战场，灯光、摄像机和开场音乐就是开战前的冲锋号，在此过程中，所有来自身体上的疲劳、不适、病痛统统都抛却了。

心态也是如此。最初几年主持春晚特别紧张，上台前极度亢奋。后来有一段时间有点懈怠了，春晚直播时，我甚至坐在后台睡着过。因此好多人就说：你这个心理素质能当航天员。我摇摇头，心里明白那不是一个好现象，因为它不是一个好的主持人应有的状态，无法彻底调动出主持时的热情。直到最近这两年，才达到一种最佳状态，开场前既不会过度兴奋，也不会特别懈怠，内心比较平静，在四个多小时的直播过程中始终保持着一定的兴奋度。我

觉得这是一种良好的状态，以一颗平常心对待春晚，沉稳地主持、控场，可以做到收放自如，游刃有余。

但具备了这些生理心理素质，并不表示直播之前就可以不做功课。我有个习惯，开演前至少半个小时会让自己保持一种安静的状态，沉下心来，梳理一遍整台晚会的几个要点，比如开场什么时候起台词、调门定到什么高度、节奏如何调整、重点节目怎么介绍、零点钟声敲响的时候该是什么状态、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……这些问题都得一一考虑到。

春晚直播和其他直播还有些差别。一般的电视直播，从录制到播出，可以有两三分钟的缓存期，若出现失误还有时间进行补救。春晚由于零点倒计时环节不容许一秒钟的误差，所以它是正负零秒的直播，一旦现场发生不测，难以补救，只能事先尽可能地做好预防措施。所以每次直播前的半小时、40分钟，我是坚决拒绝被打扰的。哪怕在人来人往的嘈杂环境中，我也要找一个角落面壁，摒除杂念，冥思。

这些年我养成了一种习惯，每次直播前都会做好心理准备，设想某种情境：现场一旦发生突发事件，自己该如何去应对？作为一名主持人，我的首要任务是让镜头跟着我离开，无论现场发生何种情况，我都要迅速找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，始终让镜头对着我，腾出一定的时间，以便让具体的专业工作人员处理现场，直到现场恢复正常，继续直播。这个习惯的产生也许和以前所经历的一些重要事件有关系。

1984年，我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合军乐团的一员，参加了建国35周年的国庆阅兵仪式。那是我第一次跟天安门结缘，也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一个国家的行为实施时，整

套系统运转起来的严谨。以军乐团单簧管演奏员朱军为例，检查步骤如下：首先，朱军要把自己的乐器安装好，由于单簧管是直筒的，安保人员会对太阳，检查里面是否藏匿东西，接着交给朱军本人吹奏几声，如果一切正常，他需要当着安保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的面，把乐器一拆解，装进乐器盒，贴上封条，最后乐器被封存。

乐器检查结束后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环节，是宣布军委的受阅命令。军委命令我们在10月1日上午10点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大典。其中有一条，无论现场发生任何突发事件，在没有听到撤离的命令之前，原地保持姿态。各个部门会对于受阅命令做具体解读，我们军乐团下达的命令，说白了就是：你在这儿站着，突然有一个爆炸物在你身边爆炸，你身旁的战友倒下了，你该干什么？答案是：你什么都不干，站在原地，保持姿态，继续演奏，直至听到撤离命令迅速撤离。

从那时起，我就潜移默化地形成了一套特殊时期的应急心理机制，并逐渐养成一种习惯。每年春晚前夕我都会有这样一些思想准备：如果真的发生不测，我该怎么办？我该转移到哪个位置？哪个位置是最安全的？哪个位置不至于被观众冲散？哪个位置可以保证我的状态在屏幕上看起来最正常？每次自己都会默默地进行一番设计。毕竟作为一个老主持人，尤其这些年几乎是春晚主持团队的主心骨，必须要对突发事件有所设想。

作为春晚的老员工，伴随着这台庞大机器的运转，自我完善，周全备份，只为直播全程中毫无瑕疵的完美表现。没有差池，完美落幕，心里才会有一种功德圆满的踏实。